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UND PROJECT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古史辨自序

上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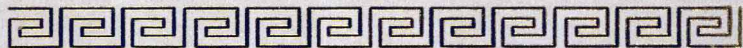
顾颉刚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古史辨自序

上册

顾颉刚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1年·北京





顾颉刚
(1893—1980)

自序

兩年前，我在努力用報附刊的讀書雜誌裡發表辯論古史的文字時，橫社同人就囑我編輯成書，由社中出版。我當時答應了，但是沒有動手。所以然之故，只因裡面有一篇主要的韓論文子，沒有做完，不然得到一個結束，我總想把它做完了纔付印。可是我的生活在太忙了，要想定心做一份為最文字，也不易找到時間，這是我永懷恨着。

千已斤月

研究我國
古的題目

作者手迹

出版说明

百年前,张之洞尝劝学曰:“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是时,国势颓危,列强环伺,传统频遭质疑,西学新知亟亟而入。一时间,中西学并立,文史哲分家,经济、政治、社会等新学科勃兴,令国人乱花迷眼。然而,淆乱之中,自有元气淋漓之象。中华现代学术之转型正是完成于这一混沌时期,于切磋琢磨、交锋碰撞中不断前行,涌现了一大批学术名家与经典之作。而学术与思想之新变,亦带动了社会各领域的全面转型,为中华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时至今日,中华现代学术已走过百余年,其间百家林立、论辩蜂起,沉浮消长瞬息万变,情势之复杂自不待言。温故而知新,述往事而思来者。“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之编纂,其意正在于此,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收纳各学科学派名家名作,以展现中华传统文化之新变,探求中华现代学术之根基。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上自晚清下至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海外华人学者的原创学术名著(包括外文著作),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体兼及其他,涵盖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学等众多学科。

出版“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为本馆一大夙愿。自1897年始创起，本馆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有幸首刊了中华现代学术史上诸多开山之著、扛鼎之作；于中华现代学术之建立与变迁而言，既为参与者，也是见证者。作为对前人出版成绩与文化理念的承续，本馆倾力谋划，经学界通人擘画，并得国家出版基金支持，终以此丛书呈现于读者面前。唯望无论多少年，皆能傲立于书架，并希冀其能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共相辉映。如此宏愿，难免汲深绠短之忧，诚盼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共襄助之。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0年12月

凡 例

一、“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晚清以迄20世纪80年代末,为中华学人所著,成就斐然、泽被学林之学术著作。入选著作以名著为主,酌量选录名篇合集。

二、入选著作内容、编次一仍其旧,唯各书卷首冠以作者照片、手迹等。卷末附作者学术年表和题解文章,诚邀专家学者撰写而成,意在介绍作者学术成就,著作成书背景、学术价值及版本流变等情况。

三、入选著作率以原刊或作者修订、校阅本为底本,参校他本,正其讹误。前人引书,时有省略更改,倘不失原意,则不以原书文字改动引文;如确需校改,则出脚注说明版本依据,以“编者注”或“校者注”形式说明。

四、作者自有其文字风格,各时代均有其语言习惯,故不按现行用法、写法及表现手法改动原文;原书专名(人名、地名、术语)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亦不作改动。如确系作者笔误、排印舛误、数据计算与外文拼写错误等,则予径改。

五、原书为直(横)排繁体者,除个别特殊情况,均改作横排简体。其中原书无标点或仅有简单断句者,一律改为新式标

点,专名号从略。

六、除特殊情况外,原书篇后注移作脚注,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夹注。文献著录则从其原貌,稍加统一。

七、原书因年代久远而字迹模糊或纸页残缺者,据所缺字数用“□”表示;字数难以确定者,则用“(下缺)”表示。

上册目录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1
答刘胡两先生书	10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16
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	114
一、古人缺乏历史观念	114
二、战国秦汉间好古者的造伪	117
三、孔子对于历史的见解	120
四、战国以前的古史是“民神杂糅”的传说	122
五、墨子的托古	123
六、种族融合过程中造成的两个大偶像	129
七、孟子的托古	136
八、阴阳五行说所编排的古史系统	143
九、道家的托古	149
一〇、战国与西汉的疑古	153
一一、司马迁与郑玄的整齐故事	163
一二、东汉的疑古	170
一三、结论	176
附言	177
原编者后记	180

三皇考	181
童序	181
自序	201
三皇太一传说演变略图	207
一、引言	208
二、“皇”字的原义	210
三、名词的“皇”的出现	216
四、“皇”的由神化人	220
五、“皇”为人王位号的实现	224
六、二皇二神和太帝	227
七、“九皇”和“民”	230
八、“太一”一名的来源	236
九、“天神贵者太一”及三一	239
一〇、太一的勃兴及其与后土的并立	241
一一、泰帝的两件故事	247
一二、西汉时三皇消沉的原因	250
一三、三皇的复现	251
一四、太一的消失	260
一五、人皇的出现	270
一六、伏羲们和三皇的并家及其纠纷	279
一七、天皇大帝与太微五帝	294
一八、盘古的出现与三皇时代的移后	312
一九、女娲地位的升降	316
二〇、三皇名称确立后对于旧名称的解释	320
二一、道教中的三皇	323

二二、太一的堕落·····	344
二三、太一下行九宫和太一的分化·····	353
二四、太一在道教中的地位·····	366
二五、太一的死亡·····	378
二六、《河图》与《洛书》·····	382
二七、《河图》、《洛书》的倒坠·····	398
二八、《三坟》与《古三坟书》·····	404
二九、近代对于三皇的祭祀和信仰·····	421
补遗七则·····	437
翁跋·····	442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我二年以来，蓄意要辩论中国的古史，比崔述更进一步。崔述的《考信录》确是一部极伟大又极细密的著作，我是望尘莫及的。我自知要好好的读十几年书，才可追得上他。但他的著作有二点我觉得不满意。第一点，他著书的目的是要替古圣人揭出他们的圣道王功，辨伪只是手段。他只知战国以后的话足以乱古人的真，不知道战国以前的话亦足以乱古人的真。他只知杨、墨的话是有意装点古人，不知道孔门的话也是有意装点古人。所以他只是儒者的辨古史，不是史家的辨古史。第二点，他要从古书上直接整理出古史迹来，也不是妥稳的办法。因为古代的文献可征的已很少，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但要承认信史便没有实际的证明了。崔述相信经书即是信史，拿经书上的话做标准，合的为真，否则为伪，所以整理的结果，他承认的史迹亦颇楚楚可观。但这在我们看来，终究是立脚不住的：因为经书与传记只是时间的先后，并没有截然不同的真伪区别；假使在经书之前还有书，这些经书又要降做传记了。我们现在既没有“经书即信史”的成见，所以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我们既没有实物上的证明，单

从书籍上入手,只有这样做才可得一确当的整理,才可尽我们整理的责任。

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但这个题目的范围太大了,像我这般没法做专门研究的人,简直做不成功。因此,我想分了三个题目做去:一是《战国以前的古史观》,二是《战国时的古史观》,三是《战国以后的古史观》。后来又觉得这些题目的范围也广,所以想一部书一部书的做去,如《〈诗经〉中的古史》、《〈周书〉中的古史》、《〈论语〉中的古史》……我想,若一个月读一部书,一个月做一篇文章,几年之后自然也渐渐地做成了。崔述的学力我固是追不到,但换了一个方法做去,也足以补他的缺陷了。

这回适之先生到上海来,因为不及做《读书杂志》的文字,嘱我赶做一篇。我当下就想做一篇《〈论语〉中的古史》,因为材料较少,容易做成。但今天一动笔之后,又觉得赶不及,因

为单说《论语》自是容易,但若不与他书比较看来,就显不出它的地位,而与他书一比较之后,范围又大了,不是一二天内赶得出的。因此,想起我两月前曾与玄同先生一信,论起这事,固然是信笔写下,但也足以说出一点大纲。所以就把这篇信稿抄在这里,做我发表研究的起点。我自己知道既无学力,又无时间,说不上研究;只希望因了发表这篇,引起了阅者的教导和讨论,使我可以把这事上了轨道去做,那真是快幸极了!

十二,四,二十七。

玄同先生:

(上略)

先生嘱我为《国学季刊》作文,我也久有这个意思。我想做的文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现在先对先生说一个大意,——我这些意思从来没有写出,这信恐怕写得凌乱没有条理。

我以为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那时人对于古代原没有悠久的推测。《商颂》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大雅》说:“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可见他们只是把本族形成时的人作为始祖,并没有很远的始祖存在他们的意想之中。他们只是认定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始祖,并没有许多民族公认的始祖。

但他们在始祖之外,还有一个“禹”。《商颂·长发》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禹的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诗》、《书》里的“帝”都是上帝。帝尧、帝舜等不算,详见后。《尚书》里可疑的

只有一个帝乙,或是殷商的后王尊他的祖,看他和上帝一样,加上的尊号,也说不定。这诗的意思是说商的国家是上帝所立的。上帝建商,与禹有什么关系呢?看这诗的意义,似乎在洪水茫茫之中,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商国。然则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小旻》篇中有“旻天疾威,敷于下土”之句,可见“下土”是对“上天”而言。

《商颂》,据王静安先生的考定,是西周中叶宋人所作的。《乐诗考略·说〈商颂〉下》。这时对于禹的观念是一个神。到鲁僖公时,禹确是人了。《阙宫》说:“是生后稷,……俾民稼穡;……奄有下土,缙禹之绪。”按:《生民》篇叙后稷事最详,但只有说他受上帝的保卫,没有说他“缙”某人的“绪”。因为照《生民》作者的意思,后稷为始事种植的人,用不到继续前人之业。到《阙宫》作者就不同了,他知道禹为最古的人,后稷应该继续他的功业。在此,可见《生民》是西周作品,在《长发》之前,还不曾有禹一个观念。这诗的意思,禹是先“奄有下土”的人,是后稷之前的一个国王;后稷是后起的一个国王。他为什么不说不说后稷缙黄帝的绪,缙尧、舜的绪呢?这很明白,那时并没有黄帝、尧、舜,那时最古的人王有天神性的。只有禹,所以说后稷缙禹之绪了。商族认为禹为下凡的天神,周族认为禹为最古的人王,可见他们对于禹的观念,正与现在人对于盘古的观念一样。

在这上,我们应该注意的,“禹”和“夏”并没有发生了什么关系。《长发》一方面说“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一方面又说汤“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若照后来人说禹是桀的祖先,如何商国对于禹既感他敷土的恩德,对于禹的子孙就会翻脸杀伐呢?按:《长发》云:“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又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是商在汤以前国势本已发达,到汤更能建一番武功,把韦、顾、昆吾、夏桀打倒罢了。禹是他们认为开天辟地的人,夏桀是被汤征伐的一个,他们二人漠不相关,很是明白。

至于禹从何来？禹与桀何以发生关系？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禹，《说文》云：“蟲也，从凡，象形。”凡，《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伯祥云：禹或即是龙，大禹治水的传说与水神祀龙王事恐相类。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九鼎是夏铸的，商灭了夏搬到商，周灭了商搬到周。当时不过因为它是宝物，所以搬了来，并没有多大的意味；但经过了长时间的保存，大家对它就有了传统的观念，以为凡是兴国都应取九鼎为信物，正如后世的“传国玺”一样。有了传统的观念，于是追溯以前的统，知道周取自商，商取自夏，自然夏、商、周会联成一系。成了一系，于是商汤不由得不做夏桀的臣子，周文王不由得不做殷纣的臣子了。他们追溯禹出于夏鼎，就以为禹是最古的人，应做夏的始祖了。书中最早把“夏”、“禹”二字联属成文的，我尚没有找到。

东周的初年只有禹，是从《诗经》上可以推知的；东周的末年更有尧、舜，是从《论语》上可以看到的。尧、舜的故事从何时起，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左传》是战国时的著作；《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也靠不住；《论语》较为可靠，所以取了它。《论语》中二次连称尧、舜，尧、舜其犹病诸。一次连称舜、禹，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又接连赞美尧、舜、禹，大哉尧之为君——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禹吾无间然矣。可见当时确以为尧、舜在禹之前。于是禹之前有更古的尧、舜了。但尧与舜、舜与禹的关系还没有提起，或者当时人的心目中以为各隔数百年的古王，如禹和汤，汤和文、武之类，亦未可知。《论语·尧曰》篇虽说明他们的传授关系，但《论语》经崔述的考定，自《季氏》至《尧曰》五篇是后人续入的。《尧曰》篇的首章，在文体上很可

见出有意摹古的样子,在宗旨上很可见出秉着“王道”和“道统”两个主义,是战国时的儒家面目。

在《论语》之后,尧、舜的事迹编造得完备了,于是有《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篇出现。有了这许多篇,于是尧与舜有翁婿的关系、舜与禹有君臣的关系了。《尧典》的靠不住,如梁任公先生所举的“蛮夷猾夏”,“金作赎刑”都是。即以《诗经》证之,《罔官》说后稷“奄有下国”,明明是做国王,它却说成舜的臣子。后稷的“后”字原已有国王之义,《尧典》上舜对稷说“汝后稷”,实为不辞。《罔官》说后稷“缙禹之绪”,明明是在禹后,它却说是禹的同官。又以《论语》证之,(1)《论语》上门人问孝的很多,舜既“克谐以孝”,何以孔子不举他做例?(2)《论语》上说“舜有臣五人”,何以《尧典》上会有九人?《尧典》上既有九人,各司其事,不容偏废,何以孔子单单截取了五人?(3)南官适说“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可见禹、稷都是有天下的,为什么《尧典》上都是臣而非君?(4)孔子说舜“无为而治”,《尧典》上说他“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又说他“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不相冲突吗?这些问题,都可以证明《尧典》出于《论语》之后。我意,先有了禅让的学说而后有《尧典》、《皋陶谟》出来,当作禅让的实证;禅让之说是儒家本了尊贤的主义鼓吹出来的。作《论语》时,对于尧、舜的观念还是空空洞洞,只推尊他们做两个道德最高、功绩最大的古王;作了《尧典》等篇,于是尧、舜的“文章”都有实事可举了。

从战国到西汉,伪史充分的创造,在尧、舜之前更加上了多少古皇帝。于是春秋初年号为最古的禹,到这时真是近之又近了。自从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畤,祭黄帝,见《汉书·郊祀志》。秦国崇奉的神最杂,名目也最诡:秦文公梦了黄蛇作鄆畤,拾得了一块石头作陈宝祠,实在还是拜物教。黄帝之祀起于秦国,说不定黄帝即是“黄龙地螾”之类。经过了方士的鼓吹,于是黄